

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对非英语移民的同化政策

杨洪贵

(渝西学院 政法与经管系,重庆 永川 402168)

[摘要] 二战后澳大利亚对非英语移民推行同化政策,试图以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构建澳大利亚文化民族的统一身份。同化政策作为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努力,有利于形成独立的民族身份,但其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不仅激起了非英语移民的抗争,而且迫使澳大利亚人对非英语移民及其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同化政策最终破产,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多元化趋势已不可阻挡。

[关键词] 澳大利亚;非英语移民;民族文化多样性;同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 D761.1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89(2002)02-0098-05

战后非英语移民的持续到来,在澳大利亚社会里产生了民族文化多样性,这对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形成的、澳大利亚人极力维护的基于不列颠制度的文化同质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从战后初期直到60年代,澳大利亚一直推行同化政策,试图把大量非英语移民同化入盎格鲁—澳大利亚人社会,以消灭民族文化多样性。本文拟就澳大利亚政府对非英语移民实施的同化政策的内涵、实施及其失败原因就进行探讨。

一、同化政策的内涵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状况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and 进程。自19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保持着人口的种族纯洁和文化同质,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种人的社会成为推动国家建立发展的精神力量,因而直到二战时期澳大利亚一直是一个基于不列颠价值和制度的种族文化同质社会。二战成为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为了保障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划,广泛地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招募移民。二战前,非英语移民被视为外来威胁,而被“白澳政策”挡在国门之外,来自英国的移民也被敦促“遵循你的英国传统并立志学习澳大利亚新军团士兵的精神”。二战后,“在澳大利亚国

内非英语移民当然是一个要谨慎对付的问题”。^{[1](P.201)}因为随战后移民计划的实施,大量非英语移民的进入已在逐渐改变澳大利亚人口的民族结构,使澳大利亚的“不列颠”同质感面临崩溃。在这样的背景下,同化政策被作为政府用以把非英语移民整合进主流社会的一种政策和方法而提出来了。

对于同化政策,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哈罗德·霍尔特如是说:“我们新来的移民必须在观点和生活方式方面迅速成为澳大利亚人。”^{[1](P.202)}国会议员基恩·威尔逊也说:“我们不要澳大利亚成为小意大利,小德国,小希腊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度,我们需要我们的移民变为澳大利亚人。我们的移民制度应该建立在接受那些愿意成为澳大利亚人的移民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而且需要将他们变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部分。”^{[2](P.211)}同化政策,即要求非英语移民以“加倍快捷的速度”,成为典型的澳大利亚人。在文化、语言上快速同化,或盎格鲁澳大利亚化,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顺应澳大利亚民风,遵从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然后消散在澳大利亚社会之中,变得无影无踪,^{[3](P.221)}从而把非英语移民在文化上、经济上和道德上都完全整合进一个同质的统一的澳大利亚社会之中,最终达到如移民部长比尔·斯内登所称的理想目标:“我们应该有一种单一的文化,每一个人都以同样

[收稿日期] 2002-01-01

[作者简介] 杨洪贵(1970-),男,四川南充人,渝西学院政法与经管系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世界现当代史研究。

的方式生活,相互理解,有着共同的愿望。^{[4](P.106-107)}这实际上是要求非英语移民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宗教等身份,接受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成为完全的澳大利亚人。同化政策的指导思想被简·马丁(Jean Martin)归纳为安居学说(the ideology of settlement),它是指导澳大利亚人对待新移民的一套信仰和价值观念。马丁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第一,澳大利亚是个民主和个人至上的社会,对任何拥有其中心价值观的人不存在阶级偏见,是慷慨热情和思想开放的;第二,所有移民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即他们能来澳大利亚是他们的幸运;第三,人们认为,在一些组织如政府资助的友好邻居理事会的帮助下,澳大利亚社会能够同化新移民,同时不会产生过分的紧张,澳大利亚社会的本质也不会产生变化;第四,任何民族群体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移民组织都是没有必要的,或被认为是对顺利同化的一种潜在威胁;第五,整合的过程包括个体的同化,并依赖双方的良好愿望;第六,如果移民被给予特殊的权利或被考虑给予任何特权,都会破坏主导的平等观念和不利于同化。^{[5](P.94-95.)}这套学说为当时官方和非官方的组织,如教会、工会、雇主和志愿协会共同遵奉。

美国的同化倾向于要求移民采纳、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而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就是要求非英语移民成为一个完全的澳大利亚人,而一个澳大利亚人的标准则是是否采取“普遍的、一色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1](P.201)}

在战后澳大利亚生活方式被作为澳大利亚民族的标志而广泛宣传。1954年澳大利亚在伦敦的移民宣传标语中称,“女王陛下看到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作为现代移民的你的生活方式”,^{[1](P.199)}澳大利亚国内,在1953年出版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一书中,作者乔治·凯格尔著声称,不能允许移民破坏澳大利亚“同质社会的共同传统习俗”。^{[3](P.221)}1957年,约翰·奥格霍迪的小说《他们是一群怪诞的暴民》告诉非英语移民,“在这个国家(澳大利亚)里有太多的新澳大利亚人还在精神上生活在他们的故土上,他们和本国人交往,并且试图保留他们的语文和风俗。斩断它!世界上没有比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更好的生活方式”。^{[1](P.202)}作家、学者以及政治家们都以不同方式宣扬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号召人们“怀着一种强烈的决心去维护和保卫它”,^{[1](P.200)}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这种生活方式面临着外来移民的威胁,只有用它去同化他们,才能保持澳大利亚社会原有的制度和传统。就这样,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作为对付非英语移民带来的多样性的信念,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和宣扬。

何为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呢?正如当时布里斯班的记者和时事评论员伊丽莎白·韦布所说:“当我谈到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时,我遇到的外国人都如在五里雾中。援引一个移民的话吧——‘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谁也没

有告诉我这是什么,但是他们在告诉我必须采用它……’”^{[1](P.202)}可见当时澳大利亚社会没有给移民关于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明确概念。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社会的精英们在50年代末期试图给它一种定义,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的形象,即“在一个家庭里,男人是家长,有一个妻子,三个孩子,银行里有一张抵押契据,车库里有一辆荷兰顿版轿车,冰箱里有福司特啤酒,冬天的下午可以抽支考林伍德或圣乔治版香烟提神。”^{[6](P.117)}这种生活方式是以“住宅和花园以及一份包括如冰箱、洗衣机、收音电唱两用机、电视机,当然还有小汽车的家庭财产清单为中心的郊区家庭生活图景。”^{[1](P.207)}在这一图景下,澳大利亚社会当然强调其占优势地位的语言,人们共同遵守的习俗、性格和传统、普遍推崇的平均主义,及其社会的中心制度和价值观念。非英语移民就被期望同化为这样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

二、同化政策的实施与失败

为达到同化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在“各地总共设立了6个移民中心和29个帮助同化目标实现的机构。”^{[7](P.74-75)}还成立了社团组织,如友好邻居协会。政府强调两条同化的渠道,其一是教育,社会上组织了许多英语课程和澳大利亚风俗习惯知识的课程提供给移民,以使移民掌握英语和理解与学会澳大利亚社会的习俗及制度规范,而且尤其强调用澳大利亚教育系统来同化移民的后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最有效的同化会发生在教育层次上,会发生在移民的子女们于澳大利亚教育系统中成长的过程中。^{[8](P.215)}其二是族际通婚,人们认为“最好的同化是在床上实现的”。^{[7](P.77)}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家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所有移民男子中,在1947-1960年间结婚的,下列人士选择澳大利亚新娘:26%的意大利人,76%的不列颠人,46%的捷克人,71%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39%的德国人。^{[8](P.215)}这曾经给澳大利亚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同化是有希望的,但这些婚姻相当部分最终以离婚而告终,这说明民族文化的差异给同化过程带来了不少的阻碍。

在众多的移民中,只有美国移民被认为同化快,“美国人很快就和澳大利亚社会打成一片,他们没有搞自己的小圈子聚在一起,不久就跟原澳大利亚人一样无法分辨了”。^{[9](P.69)}此外,被认为较易同化的是德国人、波兰人、荷兰人和其他北欧移民,这些移民的第二代就没有了原来侨民团体的观念,南欧人如意大利人、希腊人,他们成群结队地进入澳大利亚并准备在这里继续他们的群体生活,尤其是希腊人,被认为是缓慢的同化者。^{[7](P.76)}对于亚洲人,工党领袖桑塔玛巴亚曾经主张,必须审慎地控制亚洲人流入的数量,并密切注意他们是

否被同化。他说,菲律宾人易于同化,印度人不可能同化。而日本人呢,人们则还没有忘记那场战争。^{[9](P.230)}

所以,同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非英语移民如希腊人、意大利人不愿按照政府的要求和规定迅速同化,而照旧按他们自己的速度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还有许多人照旧我行我素^{[7](P.75)}。移民逐渐在澳大利亚社会培育他们自身文化上的、社会上的、经济上的“飞地”(enclave)。^{[10](P.407)}很多非英语移民依然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生活着,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各大城市都有一些地区全部住着移民,在那儿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英语。^{[9](P.67)}如悉尼有几十个移民社区,在那里英语充其量只是第二语言^{[7](P.37)}。在悉尼街头,人群中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以致英语有时候听起来反而有点稀奇,正好像在巴黎或罗马那样。^{[9](P.188)}少数民族的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语言,而且在民族聚居地的店铺、招牌上广泛地使用,如在阿德雷德,英语虽然已很普及,但很多专门名词和术语仍使用德文。移民们还出版自己民族语言的报纸和期刊,根据霍恩记载,60年代大约有70多种语言的报纸和20多种语言的期刊。^{[7](P.75)}他们尤其不满澳大利亚人单调乏味的食品,50年代到60年代,欧洲移民尤其意大利人、希腊人到澳大利亚先在移民旅馆和工作营地的厨房里保持其传统饮食习惯,继而在城乡各处开设传统风味饮食店,逐渐形成各种风味并存的局面。虽然澳大利亚反对移民以民族聚居,但移民以民族聚居的倾向却不可遏止。尤其是自费到澳大利亚的移民,如意大利人、希腊人,他们是得到亲属朋友资助后移入澳大利亚的,到澳大利亚后又投靠亲朋好友,被称之为“连锁式移民”(chain immigration),往往在城市或某些乡村小镇聚居在一处。^{[11](P.202)}即使是受政府资助的、到澳大利亚初期相当分散的移民,在他们有能力在他们选择的地区租房或购房时,他们往往希望生活在同一族源的家庭附近。^{[12](P.10-11)}就这样,在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移民的少数民族社区逐渐形成了,他们进而开始组织各种活动,举办周末学校,以传承他们的语言、文化,试图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同时,宗教的多样性,也随希腊东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移民的到来而产生了。^{[13](P.15)}大量的非英语移民的到来,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也表明同化政策已归于失败。

三、同化政策评析

同化政策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政策。因为它将“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机构看作决定民族的本质性因素,看作一种统一力量的表达,同时又把这种统一力量的表达称之为文化民族的灵魂或精神。”^{[14](P.198)}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是澳大利

利亚人的梦想。二战前,澳大利亚把种族纯洁作为创建统一的民族身份的前提而一直坚守,所以只允许英国移民到来。但到二战后,不列颠移民供应不足,新移民就从白种人欧洲输入,在承认白种人之中有不同类型(优秀的不列颠种族与欧洲大陆白种人)的同时,又把白种欧洲人与有色的非欧洲人区别开来。但也在“白种人”之下,引入了多样性成分,随大量非不列颠人的到来,种族纯洁的含义已由原来的不列颠同质性变成“白种人同质性”,结果在承认白种之下多样性的同时,以强调文化上的同质,强调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作为构建民族身份的基础。这里,同化政策就是人们意识到必须确保民族统一体的同质性时而产生出来的一项追求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政策。这种政策通过和平的文化方式来排除不相容的文化,消化被认为是相容的又已经进入了的文化,以保护一种独特的主体文化,一种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为目的。并由此把战后进入的非英少数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民族,实现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块大陆的理想。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强调的是“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具有使澳大利亚免受殖民地遗产束缚,与不列颠身份区别开来的作用”。^{[15](P.153)}有利于形成独立的民族认同。

但作为官方政策,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是强制同化,它也有着致命的缺陷。首先,同化政策要求非英语移民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与传统决裂,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文化灭绝政策。同化政策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的。在同化政策下,确定一个移民能否入境的着眼点,不是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考察各国移民的素质,而主要考虑他的肤色,种族和文化,能否被同化。同化的前提则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基于不列颠制度的文化同质社会,这种同质性不会为欧洲人进入所破坏,但不能幸免于亚洲有色人种进入。这首先把亚洲人排斥在国门之外,继而对允许进入的非英语背景的欧洲移民实行文化灭绝,要求他们采纳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放弃自己的传统、语言、文化,而且处处对他们进行歧视和排斥。因而,同化政策是“白澳政策”在新的形势下的一种体现,渗透着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是同化政策的根本特征。

其次,“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是一个散漫的同化标准。在同化政策下,澳大利亚生活方式被当作澳大利亚的民族象征来宣扬。无论官方还是百姓,在50年代都不断地要求移民采纳它,以变成一个澳大利亚人。但正如一个移民所抱怨的那样,“他们老是告诉我,必须采用它(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谁也没有告诉我。”^{[11](P.202)}在很长时间里,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人说不清而又人人不离口的术语,因而,它是一

个模糊、散漫的概念,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底蕴。^{[15](P.153)}至于后来设计出来那种标准的生活方式,即拥有小汽车、家庭、花园,但以此为基础的所谓“标准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只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理想设计出的有关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还很有距离。在实际生活中,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也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和地域差异,因而这种模式在当时缺乏普遍的代表性。这又如何能成为同化移民的标准呢?又如何能希望同化达到预期的目标呢?更何况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具体人群的传统相互作用的产物,怎么能以强求的方法形成统一的生活方式呢?

其三,澳大利亚人对非英语移民的态度普遍是负面的。同化的出发点是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16](P.518)}“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方式”,^{[11](P.202)}而对“移民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有轻视甚至蔑视的倾向”,“非英语移民被认为是一些语言陌生、个人习惯和举止奇怪而不受欢迎的人”。^{[16](P.518-519)}因而,同化政策处处体现着对非英语移民的歧视,澳大利亚人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告诉非英语移民,进入澳大利亚是他们的最大幸运,允许采纳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是对他们最大的恩赐。澳大利亚人普遍不信任在社会和文化上与自己不同的外国人,工会认为“新澳大利亚人”可能会破坏他们通过努力争取到的工作条件;新教徒不喜欢罗马天主教徒从意大利流入澳大利亚。^{[8](P.215)}而且,出身高贵的澳大利亚人拒绝同新来者接触。即使是那些人已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被同化了的“新澳大利亚人”,也只能作为“二等公民”存在。^{[5](P.95)}移民乔范尼·斯戈罗在担任了维多利亚立法委员会副主席后,仍不断抱怨警察的骚扰,抱怨同事们背后叫他“外国佬”。有的移民家庭即使在澳大利亚本地居民居住区购买到了房子,邻居有时也不欢迎,最好的表现是漠不关心。^{[6](P.121)}因而,澳大利亚人就这样“关进自己的小圈子寻求自己的满足”,^{[9](P.48)}他们往往“排斥异族,然后又谴责他们把自己隔离起来组织外国人社区”,^{[6](P.61)}口口声声宣扬同化,又以冰冷的态度拒绝移民同化。

正因为如此,非英语移民对同化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澳大利亚人的态度使非英语移民望而却步,因为与其成为陌生人群中不受欢迎的一员,倍受冷遇,还不如生活在自己的传统之中,既自由自在又有精神上的依赖。所以,非英语移民仍极力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极力形成民族聚居。另一方面,非英语移民面对不公正待遇也极力进行抗争。在同化政策下,英国移民到澳大利亚即为公民,而欧洲大陆移民则必须居住五年后才可申请入籍,有色人种为十五年。他们还被强制性安排做澳大利亚人及英移民不愿从事的脏活和累活,移

民的技术和资历得不到社会认可。安置移民的生活环境也很恶劣。正因为如此,移民的不满与日俱增。1952年和1961年,意大利移民在维多利亚州东北部的波尼吉拉营地举行示威。1952年在墨尔本马里巴隆营地爆发了绝食抗议,悉尼中央火车站和昆士兰州的安伯莱爆发了示威游行。^{[6](P.119)}而更多的人选择了离开澳大利亚。在非英语移民中,到1966年6月,有200,000人已经离开澳大利亚,决定不在澳大利亚定居。几乎40%的荷兰移民,33%的德国移民、16%的意大利移民和14%的希腊移民改变了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主意。^{[8](P.215)}1947-1971年间移民中大多数人没有定居下来,包括一些领过路费资助的人也没有定居下来。仅1966年就有18000名移民返回原来的国家。^{[9](P.66)}

这促使澳大利亚人对非英语移民及其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认识。同化政策视非英语移民的文化为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威胁,因而必须消灭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到,非英语移民的文化不可能被消灭。“即使剧烈的政治变动,如战争、压迫和国界变动都不能消灭一个群体的语言、文化和民族身份。文化的连续性可以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得到保持,即使遭到社会、宗教歧视和经济的劣势。战后非英语移民就是如此抵制了澳大利亚主流文化公开的同化压力而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文化的”。^{[5](P.176-177)}文化多样性也不是威胁,1956年移民部的一份报告中称,“其他民族的俱乐部和协会不可能对政府的政策造成威胁,移民的社会及文化活动并非须与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完全一致”。^{[17](P.34)}同时“通过研究和日常体验,人们认识到,移民组织不是社会团结的障碍,而通常是移民群体与东道主社会的桥梁”。^{[5](P.95)}1950年,移民改革团的小册子《控制还是肤色限制》指出:“非英语移民在经济、文化方面都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好处和良好的影响。”^{[2](P.203)}在60年代人们认识到,要是没有过去20年的持续移民,澳大利亚能否达到今天的先进发达是大成问题的。从长远来看,澳大利亚会由于文化相互交融而在文化和社会上得到大大的丰富。^{[8](P.216)}在某些方面,移民的作用太明显了,从而成为普遍的事实,如为澳大利亚市场提供特种商品的小型工厂的发展,特种商店和餐馆的涌现,对食物和艺术欣赏品味的改变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移民的抱负和才华使澳大利亚的持续繁荣成为可能。澳大利亚科学工业研究组织(CSIRO)里近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员是移民,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教职员是移民”。^{[7](P.77)}既然移民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澳大利亚做出了贡献,他们就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对待。

总之,同化政策引起的移民反抗,不利于社会稳定;造成移民流失,不利于经济发展;有违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潮流,不利于各族人民的正常交往也有损澳大利

亚的国际形象。强制同化有百害而无一益,而且要同化民族多样性也已不可能,民族多样性已成为必然趋势。事实上,到60年代,作为一个移民国家,非英语移民及其文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必要条件,变得越来越不可拒绝,而且由于西欧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渐消失,意味在西欧招募移民将越来越困难。这就必须要求扩大移民来源地,势必导致非英语移民及其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既然澳大利亚不继续移民就将绝对不能指望有什么未来,既然可能需要加快移民的速度,那么修改同化理论应该是一个好主意”。^{[7](P.76-77)}正因为如此,在60年代,和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种族排外和种族狭隘渐渐露出衰弱的迹象,从种族同化到种族融合的观念变化,在官方对待国内移民的态度上日益明显。多元主义,作为对付少数民族拒绝以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开始浮出水面。

参考文献:

- [1][澳]理查德·怀特著,杨岸青译,创造澳大利亚[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2]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3]John Rickard,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Australia, a Cultural History, Longman 1996.
- [4]Geoffery Bolt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the Middle Way, 1942 -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Adam Jamnozik, Cathy Boland, Robert Urquhart,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6][澳]杰弗里·博尔顿.澳大利亚历史[M].李尧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 [7][澳]唐纳德·霍恩著.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M].徐维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 [8]Brain Hodge, Allen Whitehurst, Nation and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 in a Changing World, Hicks, Smith & Sons Pty. Ltd. 1967.
- [9][美]约翰·根室.澳新内幕[M].符良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10]Mchard E. Brown and Sumit Ganguly,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T Press, 1997.
- [11]黄源森、陈弘.从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 [12]James JuPP,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Policy Options for a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3.
- [13]Anthony. H. Richmond, Im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Macmillan 1998.
- [14]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 [15]David Bennett, Multicultural States: Rethinking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Routledge 1998.
- [16][澳]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17]李凯林.澳大利亚国民素质考察报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钱荣贵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Immigrants of Non - English home background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YANG Hong - gu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Law, and Economy Management, Yuxi College, 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8,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towards the immigrants of non - English home background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ation of uniformed culture.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as an endeavor to establish a cultural nationalism was in favour of forming an independent nation. But its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of racism not only aroused the immigrants of non - English home backgrounds to fight against it but also drew Australian people's attention to reconsider those immigrants and their culture. At last the Australian assimilation policy failed, and the multi - culture trend has become irresistible in Australia.

Keywords: Australia; immigrants of non - English home backgrounds; variety of national culture; assimilation policy